



编者的话

在天津文化历史街区“五大道”之首的马路道，矗立着一座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工字形三层楼房，虽然沐浴了百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古朴典雅，这就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北疆博物院。

110年前，法国学者桑志华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孤身一人，一路辗转来到中国科考探险。这位法国博士自称“进士”，足迹遍布黄河流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历时25年(1914—1938)，行程近5万公里，收获30余万件标本，创建了享誉世界的北疆博物院。在那个时代来华的科考探险者中，桑志华是唯一把绝大部分采集品留在中国的科学家。

如今，北疆博物院以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历史文献保存完整而被称为“活化石”，成为我国早期博物馆中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前来参观，

见证着中法文明互鉴、文化科学交流的历史。

1914年3月，法国学者桑志华来到天津，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科考探险逐梦之旅。其间，不乏因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引发的故事。来华期间，他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改写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从而昭示世界：中国是古人类的摇篮！他目睹张勋复辟的北京乱象，路遇日本人为张作霖之死降半旗志哀和此后的“东北易帜”……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和数百幅珍贵图片，展示了桑志华的科考历程和科学精神，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再现了“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

桑志华是一座连接远古与现代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促进中法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在这一点上，桑志华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跨越一个世纪，由桑志华



原北疆博物院外景

逐梦东方引起的种种故事仍在继续，不断促进中法民间的人文交流。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两国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视野下，以桑志华逐梦东方所引发的中法科学文化交流、民间人文交流一定会越来越密切，并不断向广度深度发展。

一部体现三种精神的著作

乔还田

部兼有学术性、文学性的传记，的确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本书不仅恢复了桑志华本人的真实面目，而且给予他公正的评价。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忘记桑志华。讲到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也一定会提到桑志华！本书一定能对法中法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本书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

大家知道，近年来浮躁之气遍布学术界。很多学者失去了往日的定力，难以静下心来做学术研究，从而导致有独到见解的原创性作品少得可怜。

于树香女士撰写的《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一书，可谓十年磨一剑的结晶。

其一，作者是历史学博士，但不是专业研究人员，而是一直任职政府机关，分管文化工作。这部跨界创作，是业余时间完成的。没有点定力和恒心是绝对坚持不下来的。真的是难能可贵。

其二，本书创作于2002年，原拟2014年出版。人民出版社立项后，为保证书稿在学术性方面不出纰漏，不出笑话，能够经得起推敲，于树香认为必须得到古生物学专家邱占祥先生的认可。邱先生提出意见后，她又用了三年多时间进行打磨，才形成了定稿。

其三，研究桑志华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他是一个法国传教士。以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研究是一棍子打死。诚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干了不少坏事，但有些传教士也做了一些好事。

比如：近代中国第一家出版机构、第一本期刊、第一张报纸，都是传教士办的。这些出版物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些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于树香女士对传教士出身的桑志华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究和定位，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其四，作者坚持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书中大量引用了桑志华的日记和文章。作者在后记中袒露：为展示桑志华在华科考探险的足迹和取得的成果，她翻阅了桑志华著述的427万字的文献和在华期间发表的论文；为澄清一个个谜团，查阅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的有关桑志华的文章；为了弄清楚那些地质、考古、古人类和古生物化石等领域的专用术语，“恶补”了相关知识，更可贵的是，她对收集的所有信息进行了爬梳剔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公允。这是做学问的真谛和底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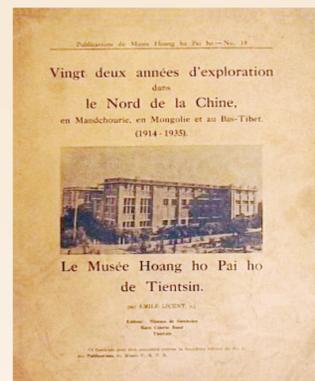
所以，我坚信，本书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作品。以后，专家们谈到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也一定会提到桑志华！一旦提到桑志华，就会想到于树香女士撰写的这本书。

第三，本书的审读、加工过程体现了编辑的工匠精神。要让书有生命力，且“比人长寿”，编辑环节必须践行工匠精神。责任编辑于宏雷在审读、加工这部书稿过程中，做到了“熟谙作者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能够“辨其所长所短”，并“具其所短”，和作者沟通、商量如何进行修改、完善和升华，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精雕细刻。可以说，从定稿内容的取舍到行文表述，从注释条目及内容的确定到全稿

结构的调整，责编与作者进行了为时两年多的反复推敲，又是数易其稿。她删除了面谈，经常“煲电话粥”，一通话就是一两个小时，就书稿中涉及考古等专业性强的内容，对翻译的人名、地名以及表述不清或有歧义的内容，商量如何求助相关专家和通晓法语的专业人士来解决难题。由于桑志华科考的地点有相当数量位于少数民族生活区域，还对涉及少数民族以及藏传佛教的相关内容做了慎重处理，请相关专家学者和宗教人士进行了审改。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是一本友情的书，是一本凝聚着作者于树香与责任编辑于宏雷友情的书。因为我是知情者、见证人，我有资格这样说。

作者为 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原北疆博物院刊物

桑志华在进行科学研究

凡是从事编辑工作的都知道，在选题环节，能不能做到发现好的作品，编辑的眼光、编辑的学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编辑要是有好“眼力”，好选题、有价值、有特色的作品，就不会从你眼皮之下“溜走”。如果没有眼光，走眼了，好作品也会从你手中溜走。可见，慧眼识珠是做编辑的基本功，是衡量一个编辑能力的一种标志。今天，面对《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这部沉甸甸的书，我很有底气地说：我的眼光、我的学识还是不错的。我没有走眼。

我不仅拍板立了项，还与作者于树香、责任编辑于宏雷围绕书稿的修改，进行过多次交流。我认为，该书体现了三种精神。

第一，本书真实再现了桑志华献身科学的可贵精神。

诚如邱占祥先生在序中所言：不要忘记桑志华！当年，桑志华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但他没有传教，而是执着地、默默地做了一件大事：创建了一个自然博物馆，从而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为了圆梦，桑志华从1914年到1938年的25年间，以苦行僧式的刻苦耐劳和献身精神，以惊人的毅力，靠驴和骡子、靠双脚，带着几个工人，跑遍大半个中国北方，搜集了大约30万件动植物、矿物和古生物化石标本。他留下的《行程录》包罗万象，从政局时事到军阀战事，从工农业生产、地貌、气象、动植物物种到普通民众婚嫁娶土民情，为后人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于树香著，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修订重印。

研究这段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必须指出的是，当年来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有很多洋人，其中不乏传教士，但不少科考者把采集品都卷走、盗走了。而桑志华则把绝大部分采集品留在了中国，并建立了北疆博物院。可以说，他是唯一的。他为古生物化石研究、古人类学、古生物学以及动植物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树香博士的这本书，真实再现了桑志华逐梦东方的全过程。尽管，如邱老在序中指出，书中还有一些“缺憾”之处，但这

系统讲述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

李家璞

今年是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创建110周年，作为2020年人民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的《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以下简称《法国“进士”逐梦东方》)，于10月修订重印发行，意义特殊。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这一历史课题或称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与探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读了于树香女士著、人民出版修订重印的《法国“进士”逐梦东方》，有几点感触。

一、该书是迄今读到的最为系统、全面、深入、客观记述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的一部专著。早在2002年，作者就在公开报刊发表了《近代法国传教士对我国北方的科学考察与天津北疆博物院》，2004年又发表了《享誉世界的北疆博物院》。作者是先从关注桑志华和北疆博物院，发表研究文章做起，进而组织将桑志华的两部法文《行程录》和相关文章翻译为中文，又自费远赴法国去桑志华的家乡和他学习、工作的地方去考察，并对桑志华经历中的时代背景做了详细考证，花费18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这部大作，填补了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系统研究的空白。对作者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搜集、选择、组织驾驭资料，最终形成专著的过程，作为博物馆人，是应当向作者学习的。

二、这部专著，文字清丽，叙事清晰，运用史料得当。作者以文学与史学、文化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笔触，谋篇设目，通篇在以文学性阐述的基础上，将学术性、专业性及其史实的严谨性寓于其中，洋洋70余万字，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底与扎实的文学功力。当下，此类专著的编写，倡导“以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呈现”，冀望有助于提升读者阅读、学习与研究的兴趣。《法国“进士”逐梦东方》这部专著，读之引人入胜，其可读性之强，是给予读者“新的阅读方式”的一个典范。

三、这部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桑志华艰苦的科考经历及其科学发现做了详尽记述。相关内容，该书作者早有专文论及，此不赘述。重要的是，这部专著对于“第一手资料”的深入发掘与科学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重要的信史。该书还综合记述了诸多专家、学者对桑志华科考与重大发现、藏于北疆博物院的重要自然标本的研究与著述情况，进一步体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此外，这部专著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具

有引领作用。笔者以为，在其启发下，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将深入发展。如：德日进等诸多外国专家在北疆博物院的研究、著述；该馆附设的图书馆所藏大量外文图书、文献资料和原版照片的深入发掘；再续写天津自然博物馆有关自然标本的再搜集和相关专家的科研成果，等等。由此看来，这部专著的修订重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四、这部专著为文物与博物院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佐证。例如，作者在“享誉世界的北疆博物院”一篇(第十四篇)中，不仅对北疆博物院的创建过程做了详尽的记述，亦对该建筑本身的构造、陈列室的布局与结构，以及标本的分类、展陈等状况做了详细刻画，以细腻平实的笔触，将一座具有学术性、科学性、知识性的早期博物馆之原生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亦应指出的是，北疆博物院旧址长期作为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室和库房，被尘封了60多年(从1949年算起)，直到2016年1月，北楼与陈列室经修缮、布展，终向社会重新开放。本人也了解到该书作者于树香女士曾为此事奔走、呼吁。2018年，修缮后的南楼向公众开放。北疆博物院是我国早期博物馆中唯一一座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历史文献完整保存至今的博物馆，在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桑志华旧居对外开放，主要展示桑志华如何筹划、建设、管理、宣传、展示北疆博物院，以及德日进等科学家在北疆博物院期间的研究与工作情况。

目前，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正在进行神甫楼(专家、工作人员宿舍)的整体修缮和展陈设计……如何让北疆博物院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服务公众，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北疆博物院的藏品，使其更好地讲述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的故事，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文化交流，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做许多工作。值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创建110周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该馆举办了“接续华章铸辉煌——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110周年特展”以及“交流互鉴 传承创新”国际研讨会。恰逢此时，于树香女士这部专著修订重印发行，读之，感慨颇深，其丰富的记述，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深入研究与运用，有诸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作者为天津博物院原院长、研究员

人物传记与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

熊亚平



原北疆博物院古生物化石大厅



于树香(左一)与法国友人在桑志华墓前合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兴起，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等多个领域取得显著进展。21世纪以来，又出现了区域史与交通史、区域史与文化史结合的新趋向。但从人物传记这一取向来研究华北区域史的论著尚不多见。近期由人民出版社修订重印的于树香女士所著《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以下简称“于著”)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集游记、科考探险记和人物传记于一体，兼具古生物学、历史学和多学科知识，于著问世后得到古生物学和历史学界多位学者的好评。仅就“人物传记与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这一主题而言，于著在选题视角、主要内容及史料运用方面，均有其特色。

于著的选题视角集中体现在“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再现了‘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例如，书中

“落脚欧式风情的天津”部分呈现了天津的历史、地理、交通、建筑、租界等，显示了西方文化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深入华北平原”部分记述了献县等地农民锻造犁铧等农具的工序、副业状况、交易习惯等；“翻开山西榆社化石‘地层编年史’新篇章”部分描述了山西大同的地理和商业等。由此，《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串起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一部天津近代史、一部近代中西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评论就显得恰如其分。

于著的内容涉及民国时期华北民众饮食习惯和风俗、交通方式、城镇发展、天津与腹地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在风俗习惯方面，记述了献县等地农民制作馒头、包子、面条、粉丝等食物的方法，天津的食品、水果，汾州小杨镇的皮影戏表演，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等，呈现了华北民众的饮食习惯和风俗。在交通方式方面，涉及了天津老龙头铁桥、金汤桥、金钢桥等桥梁及其历史，小汽车、有轨电车、西式马车和人力车以及木船等交通工具和交通工具，太原城内的汽车、人力车等交通工具，体现了华北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在城镇发展方面，考察了天津城市的历史、街区、商人、商品、租界的休闲娱乐设施，以及银行、洋行等金融机构和商业的兴盛等；山西大同的人口、商铺等；石家庄的发展历史、交通状况、居民数量、商铺等；献县的人口、经济等；正定府的街道、城墙、人口等；邢台的人口、街道等，展示了这些城镇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在天津与腹地经济关系方面，记载了天津与献县之间的木料运输，山西大同的批发商从北京和天津进货等，呈现了天津与腹地间密切的经济关系。

于著丰富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独具特色的史料来源。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占祥所言，于著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桑志华所著的两部《行程录》的中译稿。此外，作者为探寻桑志华来华之谜，曾自费前往桑志华在法国的家乡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展示桑志华在华科考探险的足迹，翻阅了桑志华撰写的400余万字的著述和论文。这些第一手资料为于著细致描述桑志华在华科考探险

经历，再现民国时期华北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尽管于著在史料翻译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对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开展，仍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一，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应重视研究视角和维度的拓展。在重视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交通史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应重视对人物传记等新视角的引入。于著的写作视角表明，人物传记的一大优势在于能够以人物的经历和行程作为中心线索，将其所见、所闻、所感结合起来，从而做到故事性强，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不仅适合专业人士阅读，而且能够惠及普通民众，从而大大扩充史学著作的受众范围。

其二，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应不断扩大史料来源。就管见所及，当前近代华北区域史论著的史料来源，主要集中在档案(如《天津商会档案资料汇编》、海关档案等)、调查报告(如《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以及日文调查报告等)、著作(如各种中、日、英文著作等)、报刊资料(如《东方杂志》、《中外经济周刊》、《工商半月刊》、《经济半月刊》等刊物、《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报纸)，但对《行程录》等资料，尤其是对法文和德文等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还比较薄弱。而于著不仅是一部语言流畅、行文严谨的史学著作，也具有其资料性。若能循其线索进一步挖掘资料，或不仅能够推进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等选题的研究，而且对天津史乃至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深入也有所裨益。

其三，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应注重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一方面，于著之所以能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者作为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史学博士，将多学科优势集于一身。另一方面，于著也启示我们，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某些选题不仅需要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而且有时也需要生物学、古气候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支撑。因此在开展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时，应立足选题需要，自觉借鉴和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补足知识结构的欠缺，不断推进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的更新。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版照片均由于树香提供